

文化与社会转型

理论框架和中国语境



曹天予 钟雪萍 廖可斌 主编

文化与社会转型

理论框架和中国语境

曹天予 钟雪萍 廖可斌 主编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 桂林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文化与社会转型:理论框架和中国语境/曹天予,钟雪萍,
廖可斌 主编. —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2. 5
ISBN 978 - 7 - 5495 - 1363 - 5

I. ①文… II. ①曹… ②钟… ③廖… III. ①社会问题—
研究—中国 IV. ①D66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2)第 045121 号

出品人:刘广汉
组 稿:魏 东
责任编辑:刘 丹
封面设计:赵 瑾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广西桂林市中华路 22 号 邮政编码: 541001)
网址: <http://www.bbtpress.com>

出版人:何林夏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销售热线:021-31260822-126/127

山东临沂新华印刷物流集团印刷

(山东临沂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新华路 邮政编码:276017)

开本:690mm×960mm 1/16

印张:20.25 字数:300千字

2012年5月第1版 2012年5月第1次印刷

定价:48.00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影响阅读,请与承印单位联系调换。

(电话:0539-2925659)

致 谢

本书出版得到
浙江大学李和声经济与文化研究中心
美国塔夫茨大学
徐子望先生
资助,特致谢忱!

前 言

—

本论文集是一个总题为“文化与社会转型”的多年项目的又一成果,旨在探讨如何根据当代中国急剧的社会变动,特别是近三十年来的改革开放的经验事实,从理论的角度认识文化与社会转型间的关系,转型的性质和动力,特别是实现转型的机制和未来走向。

从经验事实的角度出发,对于三十年来中国社会的急剧变动,可以作不同的概括。不少人把它概括成指令经济到市场经济、封闭到开放、空想到务实、传统到现代的转型;也有人把它概括成理想主义到享乐主义、集体本位到个人本位的蜕变。不管怎么概括,一致公认的事实是,三十年来大变动的起点是对“文化大革命”的否定。

“文革”十分复杂,然而,由于错误估计形势、夸大敌情,在掌握政权的情况下,对大量属于人民内部矛盾的党内政策分歧和社会上的思想意识问题,不是在尊重人权民权的基础上,按照党内民主和人民民主的程序,通过协商讨论来解决,而是持续地大范围地动用群众暴力和国家暴力,用对敌斗争的方式来处理,以致伤人太多,使一个本来合理的富有洞见的政治纲领,失去了群众的支持,失去了合法性。“文革”动乱,作为群众性政治运动的最极端形式,其对社会秩序的严重破坏和对社会各阶层的全面伤害,使得“政治运动”这一维持原有权力体制最为有效的社会控制机制失去了人心,丧失了政治合法性,彻底垮了台。粉碎“四人帮”、结束“文革”,得到全民拥护,说明人心思变,要从政治运动中摆脱出来,重组社会生活。这是中国政治发展的内在逻辑。但到底怎么变、变化的社会内容应当是什么,却主要取决于政治动员和领导权形成过

程中的政治较量和话语斗争,不存在宿命的必然。

改革过程中的政治较量和话语斗争直接表现在改革的方向上。在讨论社会类型时,人们往往专注于建构社会主导结构的决定性的社会力量(精英党或市场力量),而把文化仅仅看作是表达性的伴随现象。在观察社会转型时,人们往往专注于推动社会变革的社会力量(工农,知识分子,官僚集团,或者财富阶层)。可是实际上,任何社会力量,没有文化提供的意义结构做中介,就不可能把自己动员和组织起来,不可能使自己的期望、理想和纲领得到确切的表述,因而也就不可能发挥创造时代、转变社会的历史功能。任何社会转型,没有大多数人(人民)的参与,不可能成功。可是人民中不同人群的要求和期望不可能相同。民主革命时的农民要土地,党要执政,资本家要发财。“文革”时的造反派,“文革”后的改革派,或当前的自由派、反思派内部,都有不同的要求和期望。没有一种文化上的整合和表述,把种种异质的要求和期望纳入一种表面上同质的纲领(如社会主义或现代化),形成一种霸权话语,就不可能动员群众,形成大多数,实现社会转型。这里,文化表述,实际上是取得社会领导权和政治领导权的前提。缺少这个前提,转型不可能实现;要理解转型,就必须专注于主导话语的形成和演变。

当代中国社会转型中的主导话语形成于对外开放以后的话语导向中。在国际霸权话语(基于人性自私和个人本位的伦理—政治领域中的保守派自由主义,经济领域中的新自由主义或市场原教旨主义[所谓“别无选择”],文化领域中的消费享乐主义)的支持下,通过“计划经济行不通”、“国企低效”等历史判断,通过对人权、理性、效率、市场化、自由化、私有化、全球化、发展主义、消费主义等概念的垄断解读和反复灌输,对集体主义、阶级斗争、平等、解放、民族主义、社会主义等概念的禁用、压制或曲解,在政治、经济和文化等领域,建立起了一个以“现代化”为核心、以全球接轨为取向的新的话语导向。在这个话语的引导下,中国被迅速地纳入世界体系,产生了社会转型过程中一系列尖锐的社会矛盾和意识形态斗争。

二

本文集作者之一,伦敦政治经济学院的罗伯特·卫德(Robert Wade)教授

专门讨论全球资本主义自上世纪 20 年代以来最大的经济萧条,即 2008 年爆发的金融危机,以及全球性重组的问题,为中国当下面临的尖锐的社会矛盾提供了让人不得不清醒的全球背景。在文章最后,他引用了一句斯瓦西里人的格言:“只有当狮子们有了自己的历史学家,狩猎的历史才会以狮子的视角书写。”这是他在分析了 2008 年发生的西方金融危机引发的全球经济萧条的历史原因、现存问题和后续问题以后,针对发展中国家而言的,指出如果要“从根本上减轻发展中国家向英美新自由主义模式转变的压力”,“发展中国家必须提出新的发展模式,而不只是接受世界银行和 IMF 提供的现成的成功经验”。^①

类似这位英国经济学家的忠告其实早已存在,但是,他此次忠告的背景是资本主义世界遭遇自 1929 年经济大萧条以来最大一次经济危机。尤为重要的是,他指出,尽管资本主义世界的“国际金融体制”遭遇如此危机,现有的“国际体制”却拒绝真正的改革,在粉饰性的改革以后,它会在原有的理念和逻辑上继续运转下去。按照现有的“国际分工”和制度安排,这样的“经济复苏”从根本上说对发展中国家不会有利。此时此刻的中国则早已通过“市场改革”把自己放进了现有的国际分工和制度安排中去。卫德教授在文章里分析的发展中国家在现有模式中不断遭遇的“繁荣—萧条”周期,在这一次危机里的中国直接表现为在短时间内几千万农民工失业,日益加深的各种社会矛盾,以及与之相连的文化、理念和人心的危机。事实上这一切已经成为“繁荣—萧条”逻辑在中国社会和文化层面上的反映。尽管国际和国内主流媒体表示中国已率先走出经济危机,但是,表面的繁荣完全不意味着造成危机的根本原因已被解决,甚至也许恰恰相反。

那么发展中国家应该提出怎样的新发展模式呢?事实上,在中国这早已不是一个新问题,但对此的争论以及思考的视角大都仍然被经验和认识的程度(或者立场)所局限,有待于在理念和意识上加以清理,以求更清醒的认识和理念自觉。此次金融危机带来的全球性经济萧条,不但暴露了很多有识之士多年来警告的全球金融资本主义制度安排的诸多弊端,也直接显露出这一制度安排与理念支撑——新自由主义意识形态——之间的关联。要提出新的或者不同的发展模式,“狮子们”所需要的“自己的历史学家”,必须首先明白

^① 详见本文集中罗伯特·卫德《全球性萧条及全球性重组》一文。

自身与这一制度安排之间的关系,透过自己的视角厘清这一关系的政治经济结构以及支撑它的政治、文化和意识形态渊源。

如上所述,中国在20世纪70年代末和80年代初开始的“改革开放”,有其内在的动因和动力。在人心思改革的历史语境中,“现代化”的话语迅速成为“文革”后的政治正确话语,引导人们从“文革”时期的日常生活政治化向“去革命化”的日常生活转变。进入国人视线的西方,不再被指称为“资本主义”,而是相对落后了的中国而言的“先进”或者“发展了”的国家,是以西方经典为代表的西方精英文化,和更具冲击力的以大众文化为特征的消费文化。伴随着后者的影像和具象(visual)特征的是强烈的物质诱惑,以及诱惑背后的价值判断:物质先进等同价值先进。如此“现代”的西方世界,催生了20世纪末中国人对“现代化”的物质想象,占主导地位的“现代化”话语更是增添了满怀天真遐想急于跑步进入“全球化”的欲望。而国人浑然不察的却是“现代化”话语遮蔽了的根本问题:中国急于加入的“国际社会”性质为何?

在以美国为中心的西方世界里,20世纪70年代恰恰是建立在新自由主义理念上的、新一轮全球化资本主义逻辑和制度安排在“自由”和“市场”的名义下得以强化的过程的开始。也就是说,在逐渐“去革命化”的现代化想象中,中国从精英到民众共同想象着的“现代化”,遭遇的恰恰是以里根/撒切尔为代表的政治力量在新保守/新自由主义理念指导下推行的“华盛顿共识”模式的全球化资本主义。

“改革开放”是当代中国政治话语里的关键词,三十年来也早已成了“常识性”的字眼:“改革开放”就是走现代化道路。“开放”的反义词是“闭关自守”。“文革”一结束,中国精英就“自我批评”,说中国又犯了19世纪的闭关自守和夜郎自大的毛病,所以不仅必须改革,而且必须“开放”。在近现代中国的历史语境中,“开放”的含义其实从来都有特定指向:面对“西方”,面对欧美。这一指向在20世纪80年代的“新启蒙”文化话语中被重新恢复,看似中性的“开放”,无疑特指面向西方:将中国革命,以及革命成功后的错误和未能解决的社会经济问题,完全与封建传统相提并论,要走现代化的道路便只有“告别革命”,与西方接轨。“走向蔚蓝色”的话语蔽障掉的不但是中国近现代史的复杂性,中国革命的重大意义,也是中国与世界其他地区的交往,包括毛泽东时代与非西方世界的文化、经济和政治交往的事实和理念,等等。沿顺这一内在逻辑,90年代的“市场改革”便名正言顺地与“国际”“接轨”,成为其中

一分子。

从“现代化”、“改革开放”、“走向蔚蓝色”、“与国际接轨”等看似无香无臭的字眼里,可以感觉到很多中国精英跟洋务运动时期的精英有惊人的相似之处:一开始都很天真。

不过,与后者不同的是,今天的中国毕竟经历了洋务运动时期不曾有过的革命历史变革和历史体认,有了这一历史过程中积累起来的经验、认识 and 思想文化资源。更为重要的是,如果说过去三十年的“改革开放”确实让一部分中国人富裕了起来,那么,与全球化资本主义制度安排“接轨”后出现的日益严重的社会问题,包括以惊人速度形成的贫富悬殊,同时也给中国人带来了前所未有的对资本主义的直接体验、认识和问题意识。也许恰恰正是这样的现实,给中国人提供了前所未有的认识资本主义、反思自身“现代化”道路的契机。如何面对和认识这一契机是问题的关键。

在当下中国的语境里,要讨论前所未有的资本主义逻辑给中国社会经济结构带来的问题,要认清中国与21世纪初资本主义世界的经济危机的政治经济关系,要寻求自己的发展模式和理念,就必须面对政治话语中这样一个悖论:中国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的目标是反帝反封建,尽管中国革命是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国度中得以成功,在革命的话语中却始终涵盖着对资本主义的批判,因为中国革命的目标是在建立了独立自主的民族国家后,建设社会主义。然而,伴随着“改革开放”后的“去革命化”思潮,革命的话语和理念被边缘化,被质疑,最终被以告别革命为目标的“新启蒙”现代话语所取代。与此同时,中国在现代化的话语支撑下,经过“市场改革”全方位“与国际接轨”加入到全球化的过程中去,成为了全球化的一部分。这一过程也使中国人对资本主义所带来的深刻矛盾有了切身的体会。基于切身的体会,部分中国人又一次“梦醒”,开始对“现代化”话语所遮蔽的正在不断加深的社会矛盾进行分析和讨论,质疑和批判全球资本主义的政治经济逻辑及其意识形态理念与不断加深的社会矛盾之间的关系。作为中国历史和文化资源的革命和社会主义的理念,在这样的历史条件下就有了其作为批判和分析话语的作用。批判资本主义并非是要“走老路”,而是为了如同卫德教授所说,寻找自己的“发展模式”和理念,从而不让中国完全变成资本主义全球化的一个中转站,若干年后面临更大、更深刻、更危险的社会矛盾。

三

在观念和立场上,走出简单的自我否定的怪圈,走出按“狩猎者的历史看自己”的倾向,从“狮子”的角度认识“狩猎”的历史,是寻找自己的发展模式和理念的前提。本文集的作者们,尽管角度和立场不尽相同,却都是本着这一精神,为反思改革后文化和社会转型中的理念问题提供他/她们的思考,为打破霸权话语作理论和思想上的探讨。相对集中讨论的问题包括:(1)反思文化领域中意识形态层面上的话语和思想斗争;(2)对“现代化”理念作文化和政治经济学层面上的批判分析,包括对“启蒙”、“权利”、“民主”、“民族”等关键话语冲破现有框架的讨论;(3)重新思考中国现代历史经验,尤其是对革命历史和社会主义文化的再思考,等等。与此同时,这些不同的侧重点又相互呼应,体现出各位思考者的问题意识和视野,以及对当下中国所面对的问题之复杂性的认识。

韩毓海通过重读《甲申三百年祭》,对明朝灭亡的政治经济逻辑作了在世界史范畴内的反思,强调对国家能力和(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之间关系认识的重要性。阿里夫·德里克(Arif Dirlik)教授关于“后社会主义”的再思考,集中在对“社会主义”历史、实践和理念的不放弃,在此基础上对“后社会主义”中国的“两可性”或曰双重性作重点分析。他指出“即使在邓小平时代,以前理解的社会主义可能已经结束,但是由此认为它的遗产已经死亡却是错误的”^①。革命的遗产在价值层面上和思维方式中存在着。德里克教授认为这两个层面上的存在,可能帮助中国避免完全陷入资本主义“泥潭”。在着重分析了毛泽东的《矛盾论》和《实践论》中所显现出的毛泽东思想中关于“矛盾”的理论性认识以后,他指出这一认识的普遍意义,并分析了认识“革命遗产”与认清当下中国社会主要矛盾之间的关系。他认为:“在中国的政治和思想辩论中,有一种接受在解决这些矛盾时进行社会和政治改造的必要性的持久意愿。这种意愿是中国和其他具有类似问题的国家之间的不同之处,也证明了‘后社会主义’视角的合理性。对于这样一些改造的内涵或许没有任何分

^① 详见本文集中德里克《重访后社会主义:反思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过去、现在和未来》一文。

歧。所思考的可能性随着对世界和过去的开放也不断增多,但是思考本身的重要意义在于揭示社会主义革命遗产的持续性。”^①

本文集中,对革命资源和社会主义文化资源在当下和历史语境中加以讨论的还有蔡翔、林春等。与简单的否定革命相反,他们一方面坚持中国革命和社会主义诉求和实践的基本道义,另一方面又从不同的角度探讨如何厘清其中的问题、错误、偏差以及危机(或者“历史社会主义”失败)的根源。蔡翔对被他们称为“革命之后”的1949—1980年代的社会主义历史阶段的“五个范畴”的思考,从理念和实践诸方面,辩证地分析了社会主义诉求的基本道义和这些范畴内在(以及相互间)的矛盾,以及克服危机与寻求思想资源之间的矛盾。在分析了80年代的“知识转型”以后,他进一步指出:“社会主义若‘退场’,意味着对这一‘现代’最为重要的制衡力量的消失。而一旦资本的逻辑成为控制我们的最为主要的力量时,它可能导致的就是这个社会另一种危机的积累乃至爆发。”^②

林春的《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在世界历史中定位的政治》一文,高屋建瓴地探讨“中国道路与资本主义世界的关系,包括中国在资本主义全球化时代别样出路的可能”,指出“作为普世或普适‘世界文明主流’的资本主义并不存在。而中国在世界史中相对于其他国家的位置,正是被她突破某些资本主义时代约束的能力所决定的。20世纪中国革命的胜利改变了中华民族和世界格局,也改变了中外亿万人民的志向理想、精神面貌和生活态度”。^③在对马克思主义和中国革命的历史加以理论上的梳理之后,林春强调“中国革命是中国在世界历史中行进的一座伟大里程碑,它在一个历史悠久的大国实现了深远的现代转型,与号称普适的资本主义现代化范式匹敌,永远地改变了中国在全球体系中的位置……据此而言,世界历史的普遍语法仍然可能改写;‘定位的政治’即是创造和改变历史的政治”。^④

与关于革命和社会主义危机和遗产的讨论相呼应,其他作者从不同的角度切入80年代的“知识转型”,讨论改革以来在文化领域中的话语和思想斗争,从不同的侧面质疑和批判唯“自由主义”话语而是的“知识转型”走向。吕

① 见本文集中德里克《重访后社会主义:反思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过去、现在和未来》一文。

② 详见本文集中蔡翔《社会主义的危机以及克服危机的努力》一文。

③ 详见本文集中林春《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在世界历史中定位的政治》一文。

④ 见本文集中林春《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在世界历史中定位的政治》一文。

新雨对刘小枫“基督神学”的质疑和批判,分析了“基督神学”反启蒙反现代的实质,进而质疑刘小枫极端的反历史观。吕新雨的质疑和批判在很大程度上与柯瑞佳(Rebecca Karl)的文章遥相呼应,质疑那些或以自由主义的名义,或以基督教的名义,反历史地把文化传统和20世纪中国在社会和文化领域里的革命带上“罪恶”的帽子予以全盘否定的做法。

钱永祥先生在本文集中针对刘小枫和甘阳对施特劳斯政治哲学从不同角度的介绍和阐释进行理论上的梳理,指出尽管他们对施特劳斯的介绍和阐释发生在90年代末21世纪初,但其中的一些脉络可以追踪至80年代的“知识转型”中对革命的拒绝。他指出,“更重要的问题是:他们接受施特劳斯思想的方式,是否缺乏了一分必要的质疑?施特劳斯本身所引起的争议所在,主要集中在他对于西方现代性的激进的批判,以及这种批判所蕴含的对于启蒙价值和自由主义原则的否定”。他认为,“施特劳斯式政治哲学的内容虽然很丰富,也能注意到西方现代性在思想上的一些困难,但是这套政治哲学本身的概念架构较为粗糙,没有注意到它所假定的一些看法其实混淆了某些应该重视的区分。结果,这整套政治哲学的基础并不稳当”。^①

胡德(Daniel Vukovich)的文章对“新自由主义”话语和实践在后毛时代的“胜利”加以分析。很多人把“自由”与“民主”加以等同,对此胡德指出:“如Roberto Esposito所示:‘自由主义的意识形态,在其自身的逻辑、预设以及概念语言上[反平等主义(antiegitarian)、排他主义(particularist)、自然主义(naturalistic)]即便不是与民主的意识形态相对,也是相当不同。后者(即民主意识形态)趋向于普世主义(universalism)和平等主义(egalitarian)。’”^②

对文学和高等教育作为“知识转型”的“堡垒”的反思和批评反映在廖可斌等学者的文章里。廖可斌的《中国大学文化转型:历史、现状及路径》认为,中国大学文化是当代中国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它对当代中国大学的发展起着重要制约作用。当代中国大学文化的主要特点是集权式管理体制、实用主义办学理念和器物建设、校园活动的庸俗化。它们以中国古代高等教育文化传统为根基,又与当代中国特定社会环境相关。其中大学集权式管理体制是关键所在。中国政府有必要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战略高度,下决心对大学管理体制进行自上而下的改革,破解维护社会稳定与办好大学之间

① 详见本文集中钱永祥《多元论与美好生活》一文。

② 详见本文集中胡德《“毛主义”话语,历史的断裂和自由主义的复仇》一文。

的僵局,建立新型大学文化,促进大学健康发展。

南帆对“后三十年”文学话语中诸如“现代主义”、“现代性”和“个人主义”等关键词的梳理,显示出文学在80年代“知识转型”中所起的关键作用及其潜在的问题。在讨论中他同时又试图重启现代主义文学在当下的意义,指出:“毋庸置疑,现代主义不可能提供反抗的标准答案。现代主义告知普遍地存在一个被压抑的‘自我’,这个意图成功了;现代主义试图讲述‘自我’的本质,这个设想失败了。现代主义的最大意义在于,介入现代性结构框架内部的复杂对话:资产阶级现代性,审美现代性,或者‘反现代的现代性’。迄今为止,尽管每一种观念都拥有自己的理论谱系,但是,我仍然怀疑,‘左’与‘右’的二元对立还有足够的活力。我宁可期待复杂的对话产生某种新型的可能。”^①钟雪萍通过关注20世纪90年代以降部分作家写作和立场的变迁,考察中国文学知识分子对80年代“知识转型”的反思,以及文学创作与阅读/批评之间关系的政治经济内涵,指出这些反思以及创作和批评实践上的变化,不仅彰显出部分中国文学知识分子思考上的变化,从(照搬西方)理论到(独立)思想的努力,更重要的是,这些变化反映出文学层面上思想和立场上的张力及其重要性。

对“权利”话语的讨论是本文集的另一重点。於兴中对法律的“学术话语”与官方意识形态之间关系的讨论中,提出“国家法制主义”与“法治”之间的根本不同,前者为中国特色,“法治”、“权利”和“司法独立”等重要概念和实践均受“国家法制主义”制约而依附于当权者。在讨论了学术话语如何受制于意识形态以后,指出:“如果没有官方意识形态的配合或认可,学术话语难以影响制度的变迁和社会的转型。而学术话语自身也会在遭遇意识形态时发生变化,甚至被扭曲。从中国改革开放以来法院角色的嬗变可以看出,即使学术话语能对制度变化产生作用,这种作用也很容易被淡化或消解。官方意识形态、传统的惯性、对于中国特色的强调等等都是消解学术话语积极作用的重要因素。但是,值得深究的是,在诸多因素的影响下,中国是否可以发展出一套不同于西方的自己的法律话语?”^②与此同时,王斑和柯瑞佳对“权利”概念的讨论,将其置入具体的历史语境中,对其看似抽象和普世的内涵加以反思。柯瑞佳将中国置于世界语境中,指出“20世纪90年代以降中国社会秩序

^① 详见本文集中南帆《现代主义、现代性与个人主义》一文。

^② 详见本文集於兴中《社会转型中的学术话语、意识形态与制度的嬗变》一文。

发展中,一个主要变化就是一种看似合理的希望社会正常化/规范化的要求的提出……一个主要方面就是对法律的追求……虽然常理认为法律对社会有益,我却想反常理地指出,现有的法律化对政治追求形成了绝对性的限制,因为法律把社会关系归为合同关系,还把社会和全球关系解释成国家监管的原理……法律不足以支持对文化、社会生活和政治之间的关系的想象性再思考”^①。

王斑在考虑“权利意识”时指出:“权利,包括人权问题的提出,往往来自一个很深的文化偏见。这个观点认为自由民主国家保护人权,而专制国家压抑人权。在东西方文化之间的互相翻译和读解时,这个偏见更显突出。据称,西方拥有人权,其普遍的个人自由、世界公民的观念,与东方的所谓集体主义、家庭价值、群体伦理水火不容。再者,用人权在东西方之间划上一道鸿沟,更深的前提是,把人权与文化的优劣相提并论:维权的文明是高等文明,无视人权的威权文化是野蛮、落后的;剥夺了人权的人们不配是人,不文明;享有人权是人类文明的进步和精华。这样的偏见,把人权作为评判文明的标准,对抗所谓专制,特别是东方专制,是当今世界强势的意识形态。虽然许多自由主义批评家并没有什么恶意,但这里最大的问题是忘记了,争取权力、人的尊严和生存权的斗争,在东方西方过去现在都比比皆是,并不是什么西方自由民主的专利。”^②他对“个人权利”和“人民权力”之间的关系,对“权利意识”与“民主”之间的关系的思考很重要。

对“民主”话语的探讨与对“权利”话语的讨论是相呼应的。韩少功以看似调侃的笔调强调,“民主”不是抒情诗,只有把民主作为“施工图”真正加以落实时,才是对“新自由主义”和官僚阶层及其附庸最大的“试金石”,才能显示出在“民主”面前,究竟谁不过是好龙的叶公。李云雷对“底层文学”的综述,更是显现出“劳动者”与“资本”在当今中国社会中地位上的倒置以及与权力的关系,在文学的层面上显现出卫德教授所讨论的“新自由主义”经济学指导下的全球资本主义的政治经济逻辑:“新自由主义”经济学与真正的人民民主事实上是完全相抵制的。

^① 详见本文集柯瑞佳《20世纪90年代及其后中国的“转向权利”》一文。

^② 详见本文集中王斑《人权、民权与社会运动》一文。

四

事实上,鲁迅早就是中国的斯瓦西里人寓言的实践者,坚持要从“狮子”的角度看“狩猎”的历史,既不愿意走老路,也不愿意照搬西方。进而言之,中国革命本身更是这一寓言在中国的历史实践。在全球化资本主义的逻辑中产生的当今中国尖锐的社会矛盾,在新的历史条件下需要更多的人像鲁迅那样,敢于冲破霸权话语,认清矛盾的本质和根源。

曹天予 钟雪萍

目 录

现代主义、现代性与个人主义	南 帆	1
底层文学:理论与实践(2004—2009)	李云雷	24
文学作为话语和思想交锋		
——社会转型中的文学与作家/批评家立场变迁	钟雪萍	41
鲁迅之“罪”、反启蒙与中国的现代性		
——对刘小枫先生“基督神学”的批判	吕新雨	56
多元论与美好生活:试探施特劳斯政治哲学的两项误解	钱永祥	77
重读《甲申三百年祭》	韩毓海	98
“毛主义”话语,历史的断裂和自由主义的复仇		
.....	胡德(Daniel Vukovich)	107
20世纪90年代及其后中国的“转向权利”	柯瑞佳(Rebecca Karl)	115
中国大学文化转型:历史、现状及路径	廖可斌	131
社会转型中的学术话语、意识形态与制度的嬗变		
——对当代中国法律话语与现实的反思	於兴中	157
民主:抒情诗与施工图	韩少功	168
人权、民权与社会运动	王 斑	177

社会主义的危机以及克服危机的努力·····	蔡翔	204
重访后社会主义:反思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过去、现在和未来 ·····	阿里夫·德里克 (Arif Dirlik)	227
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在世界历史中定位的政治·····	林春	253
全球性萧条及全球性重组 ·····	罗伯特·卫德 (Robert Wade)	289
后语·····		305